

文章编号:2095-0365(2015)02-0043-05

基于农村政治场域视角的基层自治权力异化及其防治对策

——以福建南平建阳市10个村为分析对象

兰 晔¹, 郑逸芳^{1,2}, 陈建平^{1,2}

(1.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2. 福建农林大学 农村廉洁建设研究中心,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将农村自治权力置于包括外部和内部两方面不同的关键构成在内的农村政治场域之中,运用组织分析法从外部行政权力科层管理、其他村落模范作用、外来企业契约交换的角度和内部利己行为逻辑、资本不均、消极文化腐化等因素分析基层自治权力异化的过程。并根据内外因素提出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权利救济途径、疏通资本流动的联结渠道、培育更多农村非治理精英参与自治等对策,来有效促进防治基层自治权力异化。

关键词:基层组织场域;基层自治;权力异化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15.02.08

当今社会利益主体不断多元化,主体间复杂的关系交织成一个不定项发展的网络空间。这个网络被布迪厄称之为“场域”。场域分析法常常被用于分析模糊的、经验性的权力边界的权力体系。其核心在于:在场域中的任何一个社会成员所做的决定都体现着自身的意志^[1]。通过这一分析工具,可以较好地剖析权力组合的多样性和主体间的博弈,从而理顺各个主体权力运作的影响因素。村庄作为社会管理最为基础的管理层次,具有内部惯习和历史性的空间。农村政治场域中的权力关系的变动都有可能诱发自治权力异化。因此,要防治农村自治权力异化,首先要利用组织场域分析法理顺在农村政治场域中的影响权力关系的内外部因素,了解农村自治权力异化的过程和原因。对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莒口镇、麻沙镇、小湖镇、崇雒乡4个乡镇的10个村进行田野调查,共调查了包括各村村支书、村主任在内的50个村干

部和100个村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农村自治权运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外部权力主体对农村政治场域权力异化的影响

目前,农村自治组织外部权力主体主要包括乡镇政府、大型外来企业、其他村落等,他们影响基层自治权力运作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一) 科层制管理的先天影响

我国的行政权力具有科层制垂直领导的关系,乡镇政府、大型外来企业、其他村落等外部权力主体借助行政管理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村庄,而村庄只能无条件或在一定协商条件下接受和服从。在调查中,关于农村事务管理73.3%的受访者选择乡镇机关和村集体结合管理,有20.7%的受访者认为乡镇机关单位在村民事务监

收稿日期:2015-02-21

基金项目:福建省纪委监察厅2014年度重点课题“强化制约监督,让权力始终成为正能量”;2014年度福建农林大学党风廉政建设专项研究课题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兰 晔(199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腐败治理与廉政伦理。

本文信息:兰 晔,郑逸芳,陈建平.基于农村政治场域视角的基层自治权力异化及其防治对策[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9(2):43-47.

督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乡镇机关对农村自治组织具有政治领导权、经济控制权与部分人事选拔权。村庄在重大决策上必须优先以乡镇机关的意见为导向,只有乡镇机关批核才能进行民主评议程序。因此,村庄的重大决策受乡镇机关的影响多于村民自治组织本身。但凡涉及上级部门相关方针政策的落实问题,乡镇机关希望村庄会予以无条件的贯彻落实。即使是涉及村民自治的公共事务,诸如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等,乡镇机关也有可能利用下达考核指标等方式来施加影响。这样一定程度上就会限制乡村自治权的自主性和个性发展。当然,也不能对行政权力的科层制管理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乡镇机关的适当管理有利于维护村庄自治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进农村自治权的规范发展。因此,针对科层制管理对农村政治场域权力异化的先天影响力,必须依靠民主的监督使其作用更为正面,这就需要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权利救济途径。

(二) 其他农村场域的连锁影响

农村政治场域是以村庄为单位具有内部规则的空间。事实上,每一个农村自治组织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各个自治主体之间会相互进行联系、模仿,乃至比较。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所调研的四个镇的农村自治权力的环境、做法都有一定相似性。凡是出现一些自治权力运作中优秀的做法往往会被其他村落学习和借鉴,凡是出现一些权力滥用的反面做法,就会连带着对周边村落出现的类似的权力风险点予以特别关注和防范。比如,此次调查的HX村曾出现村干部在公路征地补偿项目中造假的违规做法并被惩处。自此,所在辖区的各个村落对有关征地补偿等相关事宜的审查更加谨慎严格,务求通过村民实地考察来保证征地补偿等项目的公平和公正。因此,村庄自治过程中都存在一些需要特别关注的“村落”,这些典型村落的自治权运行或更完善,或情况相似,或联系密切。任何其他农村政治场域出现打破自治权力的内部规则的情况都可能影响到另一个农村政治场域内自治权力运作的过程和结果。

(三) 外来企业的契约交换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村庄为了达到自身发展目标,与一些社会企业、金融组织保持一种契约关系。通过这种契约关系,社会企业、金融组织可以

采取多种形式影响农村自治权力。一方面,外来企业的入驻能够带动当地的就业、服务业等,但为了争取大型企业落地,农村自治组织要为大型企业入驻而让利。农村自治组织为了适应和满足“客户”的需求,会利用自身权威与一般村民积极进行调整和协商,来为这些企业争取便利来维护这种契约关系。在这一个过程,就有可能造成权力的滥用,损害到村民和村集体的利益。而大型企业为了达到自身目的,还可以通过乡镇一级向村庄实施影响。在本次调查中,JS村的养鳊厂和烤烟厂的开设消耗了村里的资源,占用了村里的土地,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村里的环境,但是并未通过全体村民的一致同意。虽然企业的入驻能带动和盘活农村资源,但是这种契约性也可能损害农村自治权力的完整性和长远的公平性,使得一些农村自治组织经不住企业、银行等外部组织提供的资金诱惑,受到外部组织的干预,从而失去村庄内部的信任基础。

二、内部权力结构要素对农村政治场域权力异化的影响

村庄的内部权力结构是指农村自治权力在不同家族、不同群体间的横向分配。内部权力结构主要有村两委干部、村民小组代表、村监会、一般村民、村中大户五大群体。村两委干部、村监会是经制度规则打造的正式权力主体。而村中大户和村民小组代表比一般村民具有更加突出的能力和资源(家族、经济资源、教育程度、技术专利),从而使他们在农村政治场域中更加具有发言权,这一类主体相对无序和不稳定^[2]。一般村民在权力结构中则属于较易被权力忽略的一类主体,他们常常依附于那些具有一定资源的权力主体,但其对于权力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每一类主体都受到村庄文化的影响,且各自拥有自己的社会资本并呈现不同的行为逻辑,消极的文化和不均的资本、利己的行为理性都是使得农村政治场域权力异化的内部因素。

(一) 资本分配不均使权力生态恶化

自治权力主体之间的冲突和整合伴随着资本要素的再分配,而资本的变动会影响自治权力场域的生态构建^[3]。在调查中,发现97.8%的村两委干部都有务农、经商等实业补贴收入,大部分村两委干部经济收入均在村平均每户收入以上。经

济资本是村民生活的基本保障,只有在生活得以保障的基础上才有足够的精力参与农村自治。35.6%的村民表示村党委干部和村委干部之间谁有能力,谁负担的任务就更重,谁的权力就更大。这反映基层自治中精英群体参与治理的重要性。村中大户和村民小组代表就是村中的精英代表。他们一般掌握了村中大部分的经济资本、人脉资本和教育资本等,使他们在村庄自治中能起到缓和作用。而一般村民由于长期处于权力缺失的弱势地位,使得村民参与村庄自治的热情趋于减弱。另外,一般村民缺少经济资本,为了养家糊口多选择外出务工,如YJ村大部分年轻村民为生计外出务工,一年中只有过年过节回到村中,村庄基本就剩下留守老人和儿童。由于久居在外,对村中事务了解程度低,这类村庄自治程度较低,自治权力的资本环境较差。

(二) 利己行为逻辑导致权力冲突

不同的农村自治权力主体出于“经济人”的利己考虑,做出相应的理性行为选择。所以,要想提高村庄自治的自主性,防止自治权力异化,就需先掌握各权力主体的行为逻辑。村两委干部、村监会作为正式权力主体具有权力主导性^[4],但随着基层自治观念的深化,其主导的程度不断被削弱,受到农村场域内其他主体的制约。另外,村两委干部之间和村两委与村监会存在不同立场、不同利益倾向的冲突,不同行为逻辑导致正式权力主体内部的不协调。不协调关系可以表现为村两委配合度不高、村监会有名无实等现象。在调查中,62.2%的人认为在面临多方利益角逐的复杂事件综合管理上村两委之间或多或少存在分歧。22.2%的人认为村两委之间职责分工还不够明确。大家一起管往往会出现斗争,尤其是事关“政绩”或经济利益较大的项目往往牵涉广、扯不清。而对于村中大户和村民小组代表这些非正式权力主体,在与正式权力主体达成协议或是受正式权力主体基于自身利益的邀约后,通过正式权力提供的途径表达自身利益,做出行为选择^[5]。因此,只有在两者达成“合谋”的情况下才能发挥非正式权力主体的作用。这种“合谋”往往需要在具有一定激励机制的环境下才能达成。只有激励非正式权力主体能够通过其他途径得以满足利己的需求,才能为一般村民去争取更多的利益,这样这种“合谋”才是长久的、“三赢”的。在调查中,33.3%

受访者认为如果没有激励机制,依靠村中大户和村民小组代表来维护自身权力效果不佳,甚至形同虚设。鉴于此,有13%的人认为应该依靠上级派遣检查员才能够解决权力运作中的大部分问题。

换句话说,此时的检查员是一种权利救济的机制,是科层制先天的正面作用,是内部无法防治权力异化向外部寻求救济的一种方式。

(三) 消极文化阻碍自治意识发展

由于封建文化、宗族文化中长期缺乏民主的基因,消极落后文化因素的影响根深蒂固,村民民主意识较弱。村民对农村政治场域中权力的治理更加依赖于权威,对自身的义务、权利知之甚少,主要表现为政治冷漠和参与主动性弱。一般村民在参与村庄自治中常常处于被动状态,尤其是文化程度较低、经济收入不稳定的村民。48.9%受访者认为村民自治意识不足是导致村民会议制度形同虚设的主要原因。90.9%的村民是在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后,才想起向农村自治组织寻求帮助。他们认为农村自治组织能够解决大部分问题就是合格的农村自治组织。而对于日常农村组织的权力运作管理并不上心,认为那是村两委的工作。因此,一般村民是以自身需求为导向作出农村基层权力监督的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导致对农村基层权力监督失真且无法常态化。

综上所述,如果村庄自治权力运作符合上述特征,则农村自治组织属于具有鲜明外部政治取向和内部行政权力取向的适应型的农村自治组织。在这样的环境下,农村自治权力过度集中,缺乏多样化的精英参政、资本流动慢,容易造成集体怠惰、民主形式化等问题,最终导致基层自治权力异化。

三、防治基层自治权力异化的路径

通过对导致基层自治权力异化的内外因素分析,发现在基层自治权力异化过程中,内外部因素是相互关联的,单个因素往往容易引发连锁的多因素异化反应。而在基层自治权力异化的情况下,自治权力主体出于“安全”考虑,做出虚伪的遵从和谨慎的反抗,将会严重影响基层自治的规范发展。因此,根据导致基层自治权力异化的内外因素,综合归纳可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权利救济途径、疏通资本流动的联结渠道、培育更多

农村非治理精英参与自治等手段,来逐步优化基层自治权力的生态环境,从而有效防治基层自治权力的异化。

(一)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权利救济

村委会不是政权性组织,其权威来至村民授权。但实际中,作为授权人的村民经常处于弱势地位,导致村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降低,造成集体怠惰。因此,必须在制度层面上,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权利救济途径。完善制度切实保障村民民主权力是根本。一般村民是村庄自治的委托,其行为能力直接影响着村庄自治的权力运行。尤其是在重大事项和与村民利益关联紧密的决策上,要充分体现村民在决策中的决定性作用,要建立村民会议和村监会决议优先制度。对于特殊事项,要建立协商制度,通过集体会议、集体谈话等制度让各位村民各抒己见,达到一致后再行决议,避免误判和不利于村集体发展的决定出现。其次,培育村民民主参与意识和公民性格。通过建立健全村民民主监督机制和优秀公民的评选等,将村民物质化的生活和村民自治权力紧密相连。在激励非正式权力主体为一般村民“发声”的同时,疏通发声渠道^[6]。通过鼓励机制打破村民长期处于被动式治理的惯习,逐步提高村民参与自治的意愿和能力。另外,要善用科层制的先天影响,利用权威与舆论的共同作用,构建多方位的权利救济途径。

(二) 疏通资本流动的联结渠道

自治权力主体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动员能力是村庄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当地激活资本流动可有效地使各权力主体得以联结和整合,从而

增强村庄内的社会关系及行动能力^[7]。村民权利意识受现实环境束缚是事实,但可以通过资本联结在参与农村公共事务中而不断觉醒^[8]。农村自治权力依托于不断成长的资本和对游离资本的吸收,不断发挥其能动性,从而促进自治权力的自主性成长。其次,要建立协商的社会沟通机制,积极构建各权力主体间的共同话语体系,减少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失真现象,强化村两委和村民小组代表大会在村庄公共事务协商中的积极作用。利用村民(代表)大会、村务公开、网络传媒等手段,实现基层党组织、乡镇基层政府、农村自治组织和普通村民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共享,克服传统乡村自上而下和无序沟通的弊端。

(三) 培育农村非治理精英参与

随着现代化媒介发展,现代性因素逐步渗入到农村社会、宗族组织等传统的利益共同体中,使其越来越融入现代化进程且越来越具有现代性意识。农村非治理精英就是在这时代境遇中涌现出来并客观存在且能发挥作用于村治场域中。农村非治理精英来源于前任村组干部、村中党员以及资本较雄厚的那一类村民。非治理精英具备了与治理精英进行商议事务的条件,有助于实现对农村治理的合理引导。一个精明的非治理精英发挥着“第三种力量”的作用,能缓解权力缺失主体和正式权力主体间的冲突^[9]。非治理精英能充分利用他与治理精英人物的广泛关系为一般村民争取利益,同时又可充分利用在一般农民中的威望和号召力为治理精英实施自治奠定基础。因此,要防止自治权力异化,势必要注意吸纳非治理精英阶层到基层自治权力领域,共同推动农村的有效治理。

参考文献:

- [1]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32-38.
- [2]汪小红.论农村场域的惯习和资本——兼论农村的内部权力结构[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71-75.
- [3]柳丽.村民自治背景下苏南农村的权力结构分析[J].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1):19-20.
- [4]萧楼,程煜.村庄精英行动的场域、组织、话语与记忆——东南沿海栖村案例研究[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4(2):18-26.
- [5]萧楼.基于村庄选举的政治场域搭建——策略中心主义研究范式[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62-70.
- [6]付建军.差序动员与消极服从:村庄精英权力再生产的行动逻辑[D].广州:华中师范大学,2014.
- [7]王诗文.资本联结:自主性资本的成长与民主治理[D].广州:华中师范大学,2014.
- [8]谢小芹,简小鹰.从“内向型治理”到“外向型治理”:资源变迁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基于村庄主位视角的考察[J].广东社会科学,2014(3):208-218.

- [9]李德. 农村社区“非精英”权力运作的实践逻辑[J]. 南京社会科学, 2010(10):94-100.
- [10]李飞龙, 赵森. 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与农村“混混”难题的破解[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1):71-76.
- [11]马小华. 规则与资源的重构: 村庄记忆变迁中精英行动策略的社会学解读[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2):13-16, 24.

Grassroots Self-governing Power Alienation and Control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Political Field: Taking 10 Villages in Jianyang City of Fujian Nanping as the Object of Analysis

LAN Ye¹, ZHENG Yi-fang^{1,2}, CHEN Jian-ping^{1,2}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350002, China;

2. Rural clean construction research center, Fujian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Placing rural autonomy in the rural political field composed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key elements, using organization analysis method, grassroots self-governing power alienation is analyzed from some factors, such as the external administrative power hierarchy management, exemplary role of other villages, the angle of external enterprises' exchange of contract, internal egoistic behavior logic, uneven capital, the negative culture of corruption, etc. Some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ure of the grassroots self-governing power alienation according to the above internal and external as follows: establish effective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right relief way, dredging connection channel of the capital flow, cultivating more non-governing that the elite participate in, and so on.

Key words: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field; grassroots self-governing; alienation of power

(上接第 32 页)

Influence of Money Supply Increment on Price Fluctuation in China: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TR Model

HU Yan-jun, PAN Huan-xue, ZOU Y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In previous researches, the influence of the money supply on the price fluctuation in China is usually ignored the asymmetry of money supply, while just the asymmetry leads to the non-simpl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ey supply and the price fluctuation, and the function deduced from transaction equation presents that the increment of money supply is the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price fluctuation rather than money supply itself. Therefore, using monthly data from 1997 to 2013, influ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ey supply growth rate and price fluctuation is analyzed empirically based on STR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between the growth of money supply and price level fluctuation there is a complex nonlinear relationship, the money supply increment of the lag period has a bigger impact on price fluctuation than the current money supply. Meanwhile, when the money supply increment is above and below a critical value, price fluctuation presents asymmetry.

Key words: money supply increment; STR model; price fluctuation